

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的公共外交效果之評估，1993～2017*

賴 聖 雅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

薛 健 吾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自從冷戰結束、中共政權進入後鄧時期之後，中國亦開始積極投入各項公共外交布局。在各種公共外交工具之中，中共最經常使用的工具即為最高領導人出訪。在中共官方的聲明裡，中國政府宣告了至少三項中國欲藉其公共外交策略來達成的主要目標：降低他國對中國威脅的感受、增加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以及促進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雙邊共同利益。本研究分析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策略從冷戰結束後實施以來至今，是否達成了上述三項官方所宣示的公共外交目標。實證資料顯示，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行為不論是在「降低他國對中國威脅的感受」上或是在「增加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上，所達到的效果普遍都不顯著，反而是與「使出訪國的國家利益更趨近中國、更疏遠美國」的這個事實有穩定的關聯性。本文的發現對於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外交政策的效果以及中美關係都提供了更具實證性的理解。

關鍵詞：公共外交、國是訪問、中共最高領導人、軟實力

* * *

註 * 兩位作者誠摯感謝本文的幾位匿名審查人對於本文的專業審查意見與寶貴修改建議。文中若有資訊錯誤之處，概為兩位作者的責任。本文所使用的各項資料與 STATA 工作流程，也歡迎隨時以 e-mail 向兩位作者聯絡索取。

壹、前言

冷戰結束後的國際局勢隨著中國的崛起而注入新的動力，國際體系的轉變影響著中國大戰略的演變與發展，中國的外交布局因而隨之調整。雖然後鄧時期中國外交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在不同領導人主政之下不時有微幅的變動，但總體來說，中國對外政策之方向仍然維持高度的一致性，即在與各國零星的小衝突中持續延續著其一貫的目標（Goldstein 2005）。然而，在實際的外交策略上，鄧小平之後的三位領導人對中國「形象經營」注重的程度則有遞增的現象，特別是近幾年來，中國外交政策最主要的轉變即為將重心投注在所謂的「公共外交」之運用上（Saunders 2006）。

挾中國崛起之勢而來的中國威脅論成為北京面對外部環境的挑戰，對長期飽受地緣政治不安全感之苦的中國而言，消除區域鄰國恐懼以確保中國經濟持續發展至關重要（秦亞青 2009; Kang 2007; Nathan and Scobell 2015; Zhang and Tang 2005）。中國外交政策的轉變與意圖，對國際關係之和平發展影響深遠，在中國國力增長與他國相應而生的威脅感下，一般認為，中國的外交政策作為主要是想要達成兩個重要目標：其一是使中國成為國際社會中不可或缺的國家，或至少要成為具有吸引力的國家（蔡東杰 2007; Kurlantzick 2007; Zheng 2005）；其二是建立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以減少他國對中國崛起的憂慮（Gill 2007; Medeiros 2007; Zheng 2005）。中國在後冷戰時期制定的時代主題乃「和平」與「發展」，除為了應對外部挑戰亦著眼於內部目標，在穩定的國際環境下繼續經濟發展以期達到建設社會主義小康社會，中國外交政策遂轉變與調整，對公共外交之重視程度日益提升。許多研究指出，中國作為世界秩序中「負責任的利益關係者」，表現在外交政策上是採取大致上穩定的與可預測的對外行為，特別是在 2001 年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會員國之後更是如此（Johnston 2003; Lardy 2002; Shambaugh 2005; Zhang and Tang 2005）。相較於傳統的作法，中國在近年來逐漸以國是訪問、熊貓外交、孔子學院、夫人外交等等更加強調「軟實力」的公共外交作為，以更彈性且多樣的方式來改善與他國之間的關係（張清敏、劉兵 2008; Hartig 2016; Saunders 2006; Medeiros 2009）。

在前述諸多中國的公共外交工具中，又以「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最為經常性且規律性地被年年使用。然而，文獻中對於中國最高領導人出訪的探討，多以描述性的分析或是政策性的時事評論為主，重點多在敘述為何中國開始注重公共外交與

最高領導人出訪，或是描述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對某些國家的出訪，而探討中國公共外交的影響的經驗研究文獻又通常僅把最高領導人出訪作為中國各種公共外交工具的其中之一（例如 Cao 2016 和 Custer et al. 2018），迄今本文尚未發現有學術文獻以一個具有可否證性的方式來系統性地探討中國最高領導人出訪是否確實達成了中共官方所預期的「公共外交」目標。本文的目的，即在於透過經驗證據的檢證，來回答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出訪是否確實達成了中國當初所規劃的目標。

本文的內容安排如下：首先在此緒論部分，本文提出了主要的研究問題；接著，本文的第二節是一個描述性的研究，分析後鄧時期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的格式化事實（stylized facts），其目的在於找出一些可能的模式以供進一步之分析。第三節是本文的主要內容，在第三節中，本文將根據第二節所發現的格式化事實來進行對最高領導人出訪的效果的探討，本節的經驗證據指出，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出訪與各項官方所宣稱的欲藉公共外交所達到的目標並未顯著關聯，反而是與「使出訪國的國家利益更趨近中國、更疏遠美國」的這個事實有穩定的關聯性。在最後的第五節中，本文將總結經驗證據的發現，並闡述本文的發現對於進一步瞭解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外交政策的運作以及中美關係的可能貢獻。

貳、後鄧時期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外交

本節分析三個議題：首先，分析「何為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以及「公共外交與傳統外交有何不同」；第二，分析為何本研究選擇探討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state-visiting diplomacy）的公共外交效果；第三，分析後鄧時期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的內容與變化各是什麼。本節對於後鄧時期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梳理出一些格式化事實，以供本文在第三節中對其效果之探討。

一、何為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在英國稱為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主要的特性是藉由即時訊息流動的溝通與宣傳，以增進對特定國家的認識（李翔宙 2011），後來在 1965 年時由美國學者 Edmund Gullion 在塔夫特大學法律與外交學院的一棟新建築落成時使用了「public diplomacy」一詞後定名至今，當時主要指涉三個方面的非正式外交活動：第一，在他國人民心中建立本國良好形象；第二，鼓勵非官方的團體與利益之間的彼此交流；第三，促進資訊與理念的流通。根據蔡東杰（2014, 286）的

分析，「傳統外交是指處理政治家和外交官間通過正統管道進行互動活動的關係，而公共外交則是指各種力圖影響公眾態度，並進而影響對方政府外交決策的作法，通常被用於傳統外交難以奏效或難以取得預期效果的領域」。也就是說，公共外交比傳統外交更多了「除了影響官方之外，還試圖影響社會大眾」的戰略意涵，這一點即為公共外交與傳統外交的最大不同之處。隨著傳媒技術的發展，人們更有意願參與政治議題、非政府組織以及公共活動，尤其是在全球化與科技技術進步後資訊媒體蓬勃，各國紛紛重視對外之國家形象和輿論走勢，期望軟性號召力或感染力得以影響他國的認知（戴紹安 2014,105-107）。在公共外交的執行中，政府致力於國家正面形象的建立以及輿論轉換，甚而引導國際聽眾的認知，相對於傳統的外交政策來說，是一個更為動態的建構過程，著眼於全球事務中影響和吸引他者的「軟實力」（soft power）（Nye 2004）。

中國在快速崛起的同時，也更加關注由文化、軟實力與國家形象塑造所組成的公共外交（d'Hooghe 2008; 2015）。根據陳雪飛（2017）的整理，自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公共外交的實踐經歷了三大階段：第一，從建政後到 1970 年代末是「初創期」，較為人所熟知的舉動包含了「乒乓外交」以及與中美、中日關係的正常化；第二，1980 年代到冷戰結束是「調整期」，伴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平」與「發展」被確定為中國外交政策的兩大主軸，過去以意識型態劃分敵我為主的國際關係戰略被較為靈活務實的對外政策所取代，許多中央部會於此時開始成立「對外宣傳小組」；第三，冷戰結束以來至今是「建制期」，此時許多更具行動力的正式機構開始成立，顯示中國開始正式重視公共外交，並把公共外交從過去間歇性的輔佐性質提升為常態性的國家外交戰略。

在最後這個冷戰結束後的「建制期」之中，中國在公共外交所進行的努力可以從一系列正式制度的設立看出端倪。1991 年，國務院新聞辦成立；1997 年，中共中央宣傳部要求把「宣傳」一詞的英文翻譯從過去的「propaganda」統一調整為「publicity」，降低其作為官方宣傳的色彩；2001 年 911 事件發生後，公共外交開始成為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研究重點；2004 年，中國外交部成立「公眾外交處」，且在 2008 年改名為「公共外交處」，並在 2009 年升格為「公共外交辦公室」，同年，中共亦宣布啟動「大外宣」的國家公關宣傳戰略；2010 年，中國外交部成立公共外交諮詢委員會，將資深外交官和學者結合起來，積極向國內外闡釋、推廣、介紹中國的外交理念；2012 年，中國公共外交協會在北京成立，更積極地將社會資源和民間力量招攬進來。在 2008 年的北京奧運和 2010 年的上海世博中，中國亦積極推廣所謂的「奧運外交」和「世博外交」，積極展現各方面的軟實力，再配合

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新華社海外分社以及中國海外文化中心不遺餘力地以世界各主要語言製作宣傳中國的新聞與節目，以及在 134 個國家地區建立了 500 所孔子學院和 1,000 個孔子學堂，冷戰後中國在公共外交上所投入的資源和努力都明顯與前兩個時期有所不同。^①

在這個後冷戰的大脈絡下，自 1993 年開始，作為公共外交工具之一、進行於中國最高領導人與他國最高領導人之間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就成為中國特色公共外交策略中的一環。前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就曾指出，中國特色的公共外交堅持統籌國內與國際兩個大局，致力於在引導外國公眾正確認識中國的同時，努力使國內公眾更加全面了解國際形勢和中國外交（蘇淑民 2008, 73）。楊潔篪（2011, 43-44）亦明確表示：

我們將緊緊圍繞首腦外交、國內大型活動和重要時間節點，廣泛開展政策宣示，進一步提高中國國家形象；優化公共外交日常和應急管理機制，加強信息發布和輿論引導。……緊密圍繞黨和國家中心工作，以服務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為根本出發點……將注重弘揚中華文明與借鑑吸納其他文明有機結合。

這句話也點出公共外交中的首腦外交及其政策宣示、與他國元首、民間團體、媒體等互動交流的重要性（袁鵬 2013, 3; 楊潔篪 2011, 43-44）。學者將公共外交歸因於全球化，強調大眾傳播媒體技術下國家形象的影響；有些學者認為中國視公共外交為策略工具，在策略管理邏輯下搭配不同種類的對策以達成特定需求（d'Hooghe 2008, 39）。亦有論者認為中國推展公共外交是面對國內民意的接收國外意識型態後的思想解放、利益團體的多樣性發展、易受鼓動的民族主義等情況下的應對，為妥善控制國內社會的穩定和在全球化潮流下站穩腳步（余金武 2015, 50; 廖登山 2007, §4）。另外，也有學者視公共外交為中國軟實力的運用，著眼於議題制定能力以及與國際行為者間的互動（Paradise 2009）。儘管學界對中國公共外交運用有不同的主張，但基本上都對「公共外交實為中國更好的對外政策工具」有一定的共識，特別是，相較於使用武力或是經濟實力，公共外交更可能有助於改善其他國家對中國之印象。

註① 上述事實由作者整理自陳雪飛（2017）。

二、最高領導人出訪為何重要

本文選擇分析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的公共外交效果主要是基於以下的理由：第一個理由在於，最高領導人出訪，一般多稱之為「國是訪問」，是所有公共外交手段中最正式的外交工具。其有一定的外交禮儀內容和正式的歡迎儀式，例如鳴放 21 響禮砲、公眾演講、新聞記者招待會等等，其象徵性意義之主要目的在於營造或建立新的友好關係（趙可金 2011, 260-267）。第二個理由在於，相較於其他公共外交的方式，最高領導人出訪是媒體宣傳效果最大的一種外交工具。國家領導人至他國訪問並非傳統外交實踐的常態，元首間相互往來建立互信，在地理已非限制阻礙的二十世紀成為有用的外交工具之一。最高領導人的出訪，意味著中國的領導人親自前往他國，會見他國元首或領導，有著最高規格的禮儀與待遇。因此，此類盛大鄭重的活動必將在兩國間被媒體報導、周知於民，這即是中國國家形象建立最主要的作用。第三個理由在於，最高領導人出訪是雙邊最高領導人最直接的溝通方式，不論是在雙邊交流、商討未來可能的合作、強化雙邊領導人的個人之間的聯繫等等，都具有最直接的效果，在衝突解決或是政策合作上，也已經被證實具有直接的影響（Haftel 2007; Kastner and Saunders 2012）。第四個、也是在理論上更具重要性的理由在於，在各種不同的公共外交工具中，最高領導人出訪是最經常也是最穩定地被中共領導人所年年採用的行為（關於這一點本文在下一節有更詳細的分析），且此舉已涵蓋絕大多數與中共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因此也是最適合被系統性檢驗其效果的公共外交手段。

因為上述四點最高領導人出訪的特質，最高領導人出訪理應要比其他的外交政策選項更可能具有公共外交的效果，然而截至目前，研究中國公共外交的文獻尚未有研究對於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到底能夠帶來多大的公共外交效果進行系統性的評估，本文的目的，即在於透過經驗資料來補足文獻中的這個缺口。^②

註② 這邊有必要將本文的研究範圍作更進一步的說明，本文的其中一位匿名審查人指出，除了最高領導人的出訪之外，中國其他高層政治人物的出訪或是出席國際場合所帶來的公共外交效果，可能完全不亞於最高領導人的出訪。本文的研究並未認為這些高層政治人物的出訪並不重要或是並未帶來相當的效果，只是把分析的範圍聚焦在集中黨書記（黨）、國家主席（政）、軍委主席（軍）權力三位一體之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出訪這一點上，除了使被分析的對象更為聚焦之外，也避免了如何適當定義「其他重要高層政治人物是哪些」以及「其他重要國際場合是哪些」的爭議，而本文以三位一體定義中共最高領導人，源於中共政治發展的特殊性，中共政治制度化前實際掌權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華國鋒與鄧小平（詳見附表 2），而後鄧時期最高領導人則分別為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中國其他高層政治人物出訪或是出席國際場合所帶來的公共外交效果，可作為另外一個題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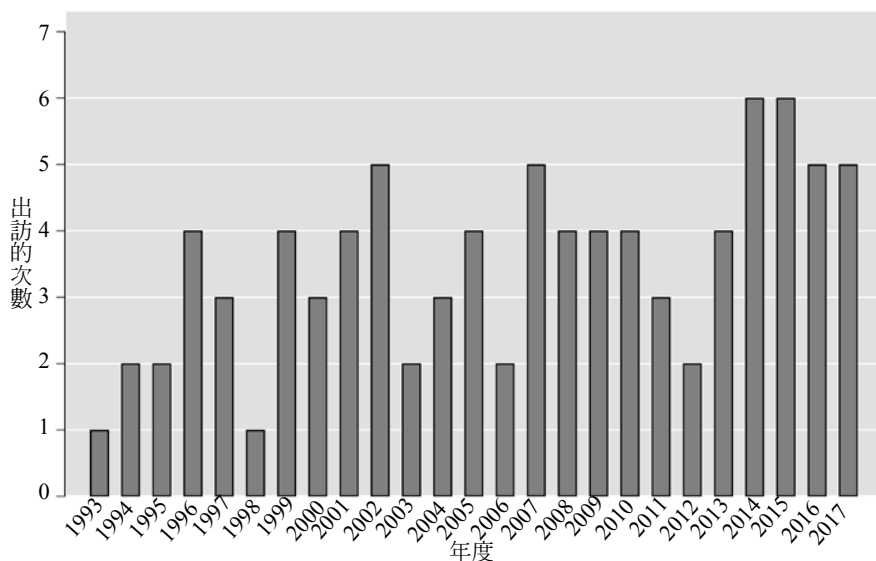
三、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政策的變化

本文主要的目的在於探討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達成了多少「公共外交」的目標。本處將探討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外交中的一些格式化事實，以作為後續評估其效果的事實背景。本文分析中共在後鄧時期歷年來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在四個重要面向上的變化，包含「出訪的次數」、「訪問的國家數與出訪的天數」、「出訪的國家與地區」，以及「出訪的時間點」。因篇幅所限，本文在正文中僅呈現格式化事實，關於每年中國最高領導人進行出訪更詳細的資料，可參見本文的附表 1。

（一）出訪的次數

圖 1 呈現從 1993 年起中共最高領導人每年的出訪次數。在圖 1 中我們可以發現幾個特徵。首先，後鄧時期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的次數，除了江澤民在 1993 年與 1998 這兩年僅僅只有出訪過 1 次之外，其他年分的出訪次數大多保持穩定，江

圖 1 中共歷年最高領導人的出訪次數（1993～2017 年）



說明：參見本文的附表 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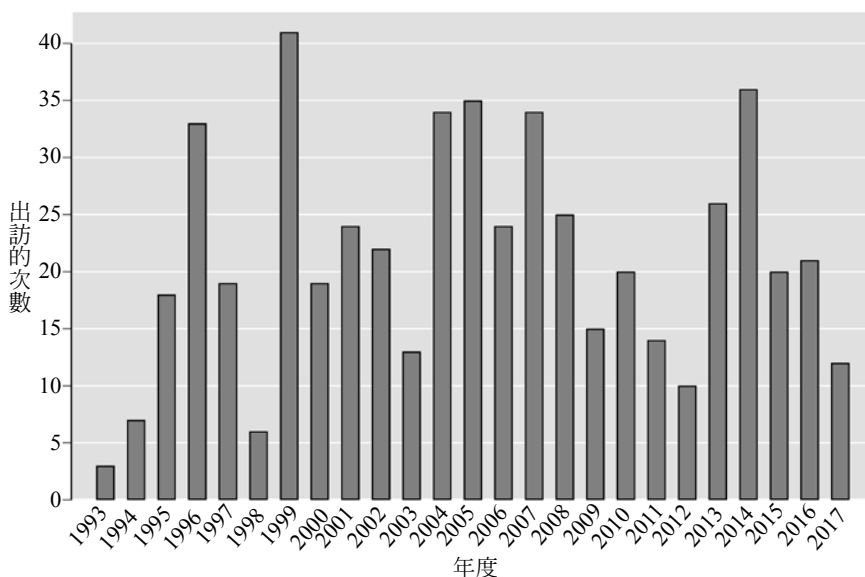
以另外一篇獨立的研究來做更加完整的探討可能更為適合。本文的兩位作者感謝該匿名審查人的建議。

澤民與胡錦濤兩人每年都規律地出訪 2 至 4 次。中共領導人從 1993 年到 2017 年的這段期間中，每年平均出訪的次數是 3.52 次。其次，相較於他的前兩任領導人，習近平的出訪行為更為活躍，更積極地使用出訪作為外交工具。習近平除了在繼任領導人後的首年只出訪了相對較少的 4 次之外，從其繼任的第二年開始，每年都至少有 5 次以上的出訪。

（二）出訪的天數和訪問的國家數

圖 2 呈現從 1993 年起中共最高領導人每年出訪天數，圖 3 則為訪問的國家數。若搭配圖 1 則可以明顯的看出，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的次數與出訪的國家數目及出訪的天數高度相關，在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尤為顯著，也就是說，中共最高領導人在出訪次數增加的同時，也拜訪了更多的國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頻頻將出訪與各式高峰會、紀念活動、國際會議等活動同時進行，所以使得出訪的天數大增，因此為求精確，本文對於出訪天數的計算，乃是以有實際進行出訪的天數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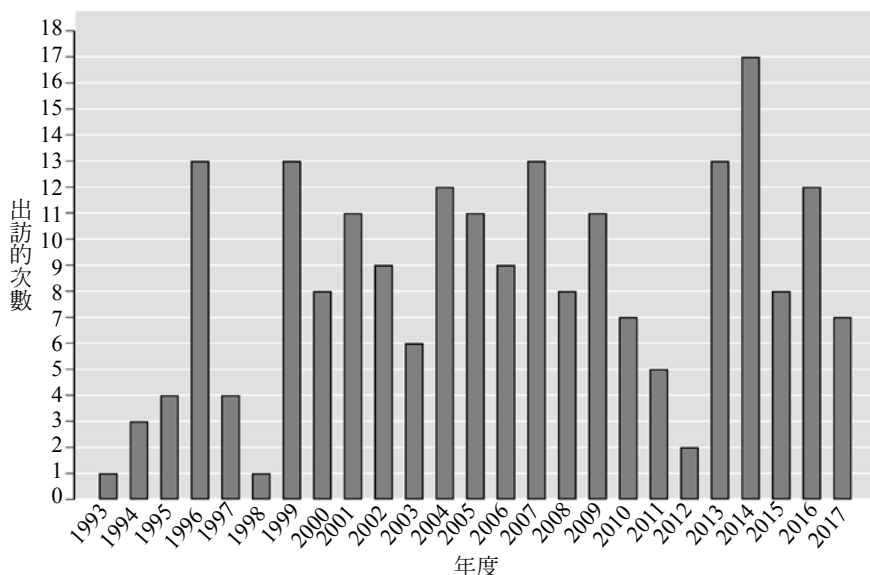
圖 2 中共歷年最高領導人的出訪天數（1993～2017 年）



說明：參見本文的附表 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3 中共歷年最高領導人的出訪國家數（1993～2017 年）



說明：參見本文的附表 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主。^③ 中共最高領導人從 1993 年到 2016 年這段期間，每年平均訪問 8.4 個國家，每年平均出訪 22.9 天。出訪國家數的最高峰為 2014 年，該年習近平訪問了 17 個國家、出訪了 36 天；而出訪國家數最少是在 1993 年與 1998 年，江澤民在這兩年分別都只訪問了一個國家，分別只停留 3 天和 6 天。出訪天數的最高峰為 1999 年，江澤民出訪了 41 天。

（三）訪問的國家與地區

接下來我們繼續觀察中國在不同領導人主政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所著重的國家與地區變化。表 1 呈現江澤民主政時期，中國以最高領導人出訪作為外交工具的

註③ 本文對於出訪天數的計算是以該最高領導人對某個國家實際進行出訪為主，不包括在同次出訪之中的其他附加行程。例如習近平曾在 2016 年 6 月 21 至 24 日出訪烏茲別克，其詳細行程為在 6 月 21 至 22 日出訪烏茲別克、在 6 月 23 日參加於烏茲別克首府塔什干（Tashkent）舉行之中俄蒙第 3 次三國首腦會晤、在 6 月 24 日參加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因此該次習近平實際的出訪天數應為 6 月 21 至 22 日，共 2 天。

情形。從表 1 的觀察中我們可以發現兩個特徵：第一，江澤民在擔任第二任國家主席的期間，出訪的次數與出訪的國家數都多過於他的第一個任期。第二，相較於世界上其他的地區，江澤民的出訪明顯著重於亞太國家與歐洲國家，其對這兩個地區投注的程度大於同一時期的其他地區。

表 1 江澤民歷年訪問的國家與地區（1993～2002 年）

江澤民（1993～2002）訪問地區與出訪國家數目										
	第一任					第二任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美國					1					
俄國					1				1	
歐洲		1	3	3			6	1		5
亞太		2	1	4		1	4	5	5	
美洲	1				2				5	
非洲				4				1		1
中東				2			3	1		3

說明：參見本文的附表 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2 呈現胡錦濤主政時期中國以最高領導人出訪作為外交工具的情形，有三點特徵值得注意：首先，與他的前任領導人江澤民不同，胡錦濤在他的第一個任期有著更多的出訪次數及出訪國家數。第二，和他的前任領導人江澤民相比，胡錦濤不僅將出訪的重心放在亞太國家，也增加了美國與非洲國家的出訪次數。第三，江澤民在十年任期中僅訪問過俄國 2 次，而胡錦濤則以每兩年一次的高頻率出訪俄國。

表 2 胡錦濤歷年訪問的國家與地區（2003～2012 年）

胡錦濤（2003～2012）訪問地區與出訪國家數目										
	第一任					第二任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美國				1					1	
俄國	1		1		1		1		1	
歐洲		4	3		1	1	3	2	1	1

胡錦濤（2003～2012）訪問地區與出訪國家數目										
	第一任					第二任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亞太	5	1	5	3	3	4	2	2	2	1
美洲		4	2			3		3		
非洲		1		2	6		4			
中東		2		3	2		1			

說明：參見本文的附表 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3 呈現習近平主政時期中國以最高領導人出訪作為外交工具的情形，我們可以觀察到一些特徵：首先，習近平從接任的第一年開始便隨即將出訪作為主要的外交工具，不僅每年的出訪次數較之前的領導人大幅增加，而且出訪的國家數目也更多。第二，在習近平的出訪戰略中，亞太國家似乎是其所關注的主要重心。表 3 可明顯看出，習近平比他之前所有的領導人更頻繁地使用出訪這個外交工具，這可能與他所大力推動的「一帶一路」戰略有著緊密的關係。

表 3 習近平歷年訪問的國家與地區（2013～2017 年）

習近平（2013～2017）訪問地區與出訪國家數目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美國			1		
俄國	1				1
歐洲		4	1	3	3
亞太	6	9	3	3	3
美洲	3	4		3	
非洲	3		2		
中東			1	3	

說明：參見本文之附表 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在下面的表 4 中，我們進一步比較鄧小平之後的三位不同領導人的出訪在出訪對象上的差異，以各個主要大國與地區來區分。從表 4 中我們可以觀察出幾個有趣的事實：第一，在對主要大國的出訪方面，胡錦濤頻繁地出訪俄國；第二，在三位領導人中，只有習近平至今尚未以國家領導人的身分正式訪問日本，這可能與習近平上任以來與日本在東海區域持續的領土衝突有關；第三，三位領導人的出訪皆對「亞太地區」投注較多的心力，對亞太地區國家的出訪遠遠多於其他的地區；第四，與其他領導人相比，胡錦濤更多地將出訪的注意力轉移至非洲與拉丁美洲國家，這可能是他在其任內推動「領導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大戰略考量的結果。

表 4 後鄧時期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的對象與次數之比較（1993～2017 年）

出訪的對象	江澤民 (1993～2002)	胡錦濤 (2003～2012)	習近平 (2013～2017)
出訪各個主要大國			
美國	1 (1997)	2 (2006, 2011)	1 (2015)
加拿大	1 (1997)	2 (2005, 2010)	0
俄國	2 (1997, 2001)	5 (2003, 2005, 2007, 2009, 2011)	1 (2013, 2017)
日本	1 (1998)	1 (2008)	0
德國	1 (1995, 2002)	1 (2005)	2 (2014, 2017)
法國	2 (1994, 1999)	2 (2004, 2010)	1 (2014)
英國	1 (1999)	1 (2005)	1 (2015)
義大利	1 (1999)	1 (2009)	0
出訪的地區			
亞太	24	33	26
中東	9	8	4
非洲	6	13	5
拉美	9	15	11
歐洲	19	15	11

說明：(1)表格內的數字為出訪的次數，括號內的數字為出訪該國的年分。

(2)主要大國是指八大工業國組織（Group of Eight, G8）的成員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接著，表 5 比較了後鄧時期三位領導人的出訪行為。從表 5 中我們可以觀察出

表 5 後鄧時期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行為之比較（1993～2017 年）

江澤民（1993～2002）				胡錦濤（2003～2012）				習近平（2013～2017）			
年分	出訪的次數	出訪的天數	出訪的國家數	年分	出訪的次數	出訪的天數	出訪的國家數	年分	出訪的次數	出訪的天數	出訪的國家數
1993	1	3	1	2003	2	13	6	2013	4	26	13
1994	2	7	3	2004	3	34	12	2014	6	36	17
1995	2	18	4	2005	4	35	11	2015	6	20	8 (US)
1996	4	33	13	2006	2	24	9 (US)	2016	5	21	12
1997	3	19	4 (US)	2007	5	34	13	2017	5	12	7
1998	1	6	1	2008	4	25	8				
1999	4	41	13	2009	4	15	11				
2000	3	19	8	2010	4	20	7				
2001	4	24	11	2011	3	14	5				
2002	5	22	9	2012	2	10	2				
平均	2.9	19.2	6.7	平均	3.3	22.4	8.4	平均	5.2	23	11.4

說明：括號中的 US 為在該年出訪美國。粗黑色數字表示在該年出訪的國家數目較前一年大幅增加。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幾項值得注意的特點：第一，領導人的出訪次數與訪問國家的數目，似乎會在政權轉移的期間中減少，也就是說，新的領導人初接政權時，其出訪的次數明顯減少；而在領導人主政的中期，其出訪的次數與訪問的國家數都會開始增加。第二，從表 2 中看來，後鄧時期的三位領導人在接掌政權後開始進入權力穩定的期間，將會開始對美國進行出訪。第三，中共領導人在第一次對美國進行出訪前都有一個饒富興味的特點，也就是他們在訪問美國之前的一、兩年，出訪的次數和訪問國家的數目都會有顯著的大幅度成長。從這三個模式來看，後鄧時期中國公共外交策略中的最高領導人出訪政策應用，似乎是會隨著中共領導人在政治繼承後的權力掌握情形而起伏變動，而表現在領導人當政的政治周期上，這個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暗示著，後鄧時期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出訪，可能與領導人主政期間的權力鞏固程度有所關聯。最後的第四個特點是，不論是從出訪的次數、出訪的天數、或者是訪問的國家數來看，後面的領導人在平均上都有比前一位領導人更為增加的趨勢，可見中國對於最高領導人出訪的外交策略的投入程度是一直不斷地在增加的。

本節說明為何選擇分析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的公共外交效果，並分析了在鄧小平之後的三位最高領導人出訪行為的不同模式。在下一節中，本文將透過經驗證據來評估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到底為中國帶來了多大程度的公共外交效果。

參、評估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的公共外交效果

在中國官方的宣示與有關的研究中都曾指出，中國進行公共外交的主要目的是要達成三大目標：第一，降低他國對中國威脅的感受；第二，增加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第三，促進中國與他國的雙邊共同利益。本節將以經驗證據來驗證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出訪是否能夠有效地達成中國官方所宣稱的這三大公共外交目標。^④

註④ 當然，中國領導人在每一次對不同國家的出訪都有其獨特的目的，例如對甲國的出訪可能是為了加強雙邊的能源合作，對乙國的出訪可能是為了加強雙邊的經貿合作，對丙國的出訪可能是為了加強雙邊的防衛合作，對丁國的出訪可能是為了支持某個較為親中國的政權或是領導人的政治生存等等，這邊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的研究旨趣並不在於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地去探討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對其出訪之後是否確實在這些特定面向上達到了加強合作的目的（因為這牽涉到我們必須要先知道中國對該國出訪的真正目的是什麼，這一點幾乎無法證實），而是以一個中國進行「公共外交」的整體角度，來探討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出訪在「整體趨勢」上到底達成了多少「公共外交」的效果。

一、是否降低了他國對中國威脅的感受？

本處將透過對下列六個議題的回答，來檢證中國最高領導人出訪政策的使用是否成功的降低他國對中國威脅的感受。第一個議題是，美國的民衆對中國的態度是否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有所改善？第二個議題是，日本的民衆對中國的態度是否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有所改善？之所以選擇美國和日本，除了中國與這兩國之間的關係都是中國所想要積極改善的「大國間關係」之外，也是基於一個最低可能性（least possible case selection）的研究設計考量，因為美國為當代國際體系的領導者，而國際關係理論普遍預期中國的崛起可能具有改變體系領導者的制度安排的性質，至於日本則為中國在亞洲的主要對手國，而且中日關係從二戰以來齟齬不斷，也是普遍被認同的事實。因此，如果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在可能性最低的美國和日本都能夠帶來改善雙方彼此印象的效果的話，則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就可說是一項成功的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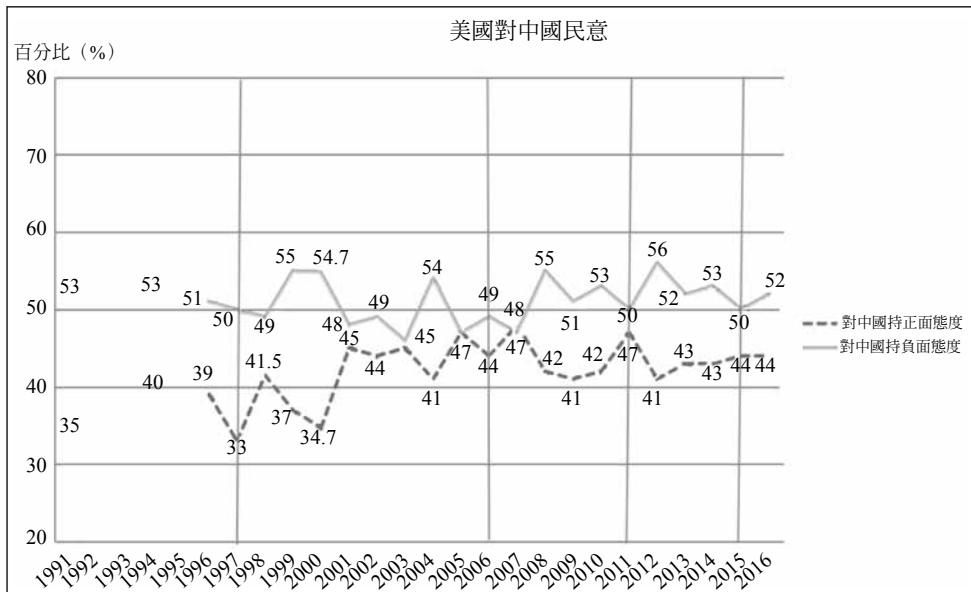
除了美國與日本的民意之外，本節還探討其他四個有關中國最高領導人出訪政策的使用是否能成功降低他國對中國威脅的感受的議題：第三，中國最高領導人出訪政策的使用是否使其他國家對中國的好感程度增加？第四，中國與其訪問國之間起衝突的可能性是否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有所減少？第五，中國與其訪問國之間的實質合作次數是否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有所增加？第六，中國與其訪問國之間軍事化衝突發生的機率是否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有所減低？選擇上述四項議題作為觀察的考量是顯而易見的：若中國最高領導人出訪的運用確實有助於降低他國對中國的威脅感受，則我們應該要看到，中國最高領導人出訪的訪問國對中國印象的改善、更多的雙邊合作以及更少的雙邊衝突都應該要有顯著的正面影響。以下我們一一檢證之。

（一）是否改善了美國民衆對中國的態度？

圖 4 顯示了歷年來美國的民意對中國態度的變化，圖中的虛線表示對中國持正面態度的比率，實線表示對中國持負面態度的比率，四條直線標示中國領導人對美國進行出訪的時間。圖 4 中包含了幾個訊息：第一，這二十幾年以來，美國人民對於中國的態度基本上可以說是相對地穩定，大約有 40% 左右的美國人民對中國是抱持著較為正面的態度，而有 50% 左右的人民對中國是抱持著較為負面的態度，這個相對比率歷年來的變動起伏並不大（若對照下圖 5 的日本民意變化更能突顯這一點）。第二，在 2006 年以前，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美國，對於美國人民對中國

態度的影響是正面的。1997 年江澤民的出訪和 2006 年胡錦濤的出訪之後，美國人民對於中國的好感度都有微幅上升的趨勢。第三，然而，從 2011 年開始，中國對美國兩次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對於美國人民對中國的態度開始帶來了負面的影響。2011 年胡錦濤的出訪和 2015 年習近平的出訪之後，美國人民對於中國的好感度都有下降。整體而言，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對於改進美國人民對於中國的態度效果並不明顯。

圖 4 美國人民對中國態度的民意演變（1991～2016 年）^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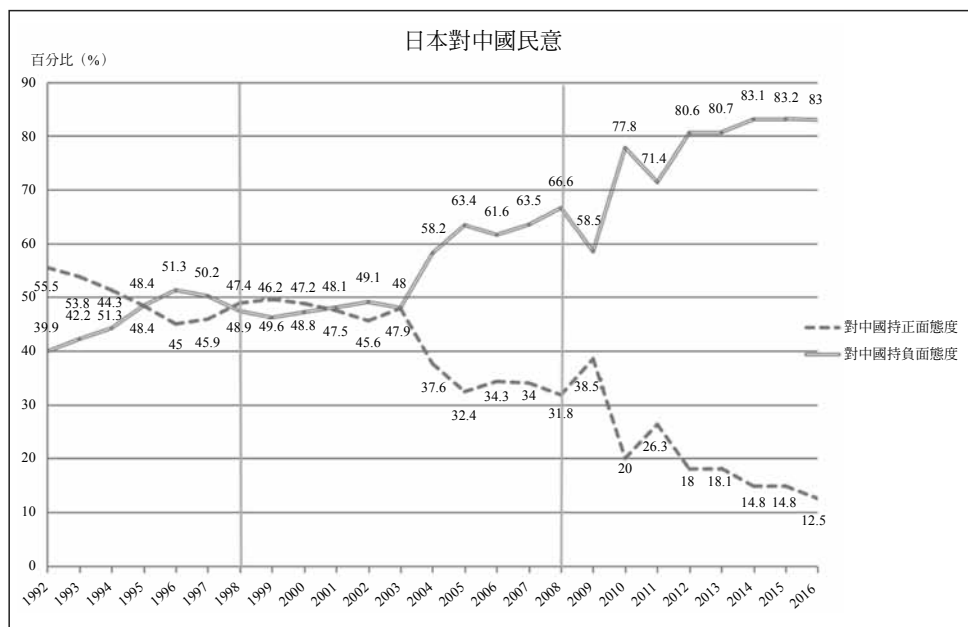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Gallup Survey (2015)。

註⑤ 在 1996 年之前，Gallup 只有在 1991 年和 1994 年分別做過兩次調查，在 1996 年以後則是每一年都有做調查。在 1998、1999 和 2000 這三年，Gallup 每年做了三次的調查，所以這三年的民意值是取三次調查的平均數。Gallup 的問題是「整體來說，你對於中國的態度是如何？非常喜歡、大部分喜歡、大部分不喜歡還是非常不喜歡？」(What's your overall opinion of China? Is it very favorable, mostly favorable, mostly unfavorable or very unfavorable?)，本文把回答「非常喜歡」與「大部分喜歡」的比率加總為對中國「持正面態度」，把回答「大部分不喜歡」和「非常不喜歡」的比率加總為對中國「持負面態度」。

（二）是否改善了日本民衆對中國的態度？

圖 5 顯示了歷年來日本的民意對中國態度的變化，圖中的虛線表示對中國持正面態度的比率，實線表示對中國持負面態度的比率，兩條直線標示中國領導人對日本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的時間。圖 5 中包含了幾個訊息：第一，在 2003 年以前，日本的人民對中國持正面態度的人數與對中國持負面態度的人數是不相上下的五五波。第二，在 2003 年之後到 2008 年之間，日本人民對中國持正面態度的比率突然一下子減少了大約 10-15 個百分點，但在這五年之間，一般來說日本人民對中國持正面態度的比率仍然可以維持在 35% 左右的比率。第三，在 2008 年之後，日本人民對中國持正面態度的比率開始急遽下降，到 2016 年更是跌到了谷底，只有 12.5% 的日本人民對中國抱持正面的態度。第四，就最高領導人出訪的效果來說，中國最高領導人在 1998 年的出訪，似乎起到了一些穩住日本人民對中國態度的作用，然而中國最高領導人在 2008 年的出訪不僅未帶來正面的影響，反而使日本的人民對中國態度急遽惡化。總結圖 5 的訊息可知，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在日本的民意方面並未帶來改善雙方關係的效果。

圖 5 日本人民對中國態度的民意演變（1992～2016 年）



資料來源：日本內閣府大臣官房政府広報室（2017）。

總結來說，圖 4 與圖 5 的資料顯示，不論是在美國或是日本，人民對中國的態度都未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而出現改善的情形，反而是，在近年來中國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的效果都與預期中相反，美國與日本的民衆對於中國的態度甚至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還有所惡化。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似乎未在美國與日本發揮預期的作用。

（三）是否改善了其他國家對中國的態度？

接著檢視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是否改善了其他國家對中國的態度，關於其他國家對中國的態度變化，目前唯一可得的較具系統性的調查資料即為著名的智庫「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針對全球國家和地區所做的「對中國的觀感」（View of China）調查。該調查統計在各個年度中各國人民對中國擁有好感（favorable）與反感（unfavorable）的百分比。該調查從 2005 年開始進行，之後每年調查一次，但每年參與調查的國家有所不同。本文將這 12 年（2005～2016）以來所有參與調查的國家其民意對中國抱持正面態度的百分比列出如表 6，並觀察各國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對中國觀感的變化。

根據表 6 的資料，中國在 Pew 的調查有涵蓋的「國家一年度」資料中總共進行了 44 次的最高領導人出訪（表 6 以灰底顯示的部分），其中有 13 次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的當年 Pew 並未進行調查（表 6 以…顯示的部分），有 3 次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的後一年 Pew 未進行調查，所以總共有 28 次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的當年以及後一年都有調查紀錄的資料，可供本文對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前後該國人民對中國好感度變化的比較。在這 28 筆資料當中，有 14 次（50%）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後人民對於中國的好感度是提高的，也有 14 次（50%）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後人民對於中國的好感度是減低的，雖然一個國家的人民對於中國的態度很顯然地會受到許多不同因素的影響，但從整體而言的趨勢可以看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對於提升受訪國的人民對於中國的好感度來說，並沒有帶來明顯而穩定的效果。

（四）是否減少了雙方衝突的可能性？

從本處開始探討的議題，由於可得的跨國跨時（time-series cross-section）的資料足夠讓我們進行大樣本的統計分析，因此本文將以統計分析的方式來探討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在各個方面是否達到了預期的效果。在以下的每一個模型中，本文以一個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來表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在該年是否出訪過該國，若尚未出訪過則編碼為 0，若已經出訪過則編碼為 1。如果中國的最高領導

國家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約旦	43%	49%	46%	44%	50%	53%	44%	47%	40%	35%	33%	
黎巴嫩	66%		46%	50%	53%	56%	59%	59%	56%	53%	52%	
巴基斯坦	79%	69%	79%	76%	84%	85%	82%	85%	81%	77%	82%	
土耳其	40%	33%	25%	24%	16%	20%	18%	22%	27%	21%	18%	
以色列			45%		56%		49%		38%	49%	55%	
巴勒斯坦			46%		43%		62%		47%	61%	54%	
埃及		63%	65%	59%	52%	52%	57%	52%	45%	46%		
〔非洲國家〕												
奈及利亞		59%	75%	79%	85%	76%			76%	70%	70%	
肯亞		...	81%		73%	86%	71%		78%	74%	70%	
迦納			75%						67%	61%	80%	
南非			...	37%					48%	45%	52%	
坦尚尼亞			70%	71%	77%	74%	
烏干達			45%						59%	61%	65%	
〔拉美國家〕												
墨西哥	...		43%	38%	39%	39%	39%	40%	45%	43%	47%	
阿根廷			32%	34%	42%	45%			54%	40%	53%	
巴西						52%	49%	50%	65%	44%	55%	

國家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智利			62%						62%	60%	66%	
〔歐洲國家〕												
西班牙	57%	45%	39%	31%	40%	47%	55%	49%	48%	39%	41%	28%
波蘭	37%		39%	33%	43%	46%	51%	50%	43%	32%	40%	37%
希臘				...				56%	59%	49%		57%

說明：(1)Pew 在調查中所使用的問題是「你對中國的看法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Do you have a favorable or unfavorable view of China?) 本文把回答「非常喜歡」(very favorable) 與「有些喜歡」(somewhat favorable) 的比率加總為對中國「持正面態度」(favorable)，把回答「有些不喜歡」(somewhat unfavorable) 和「非常不喜歡」(very unfavorable) 的比率加總為對中國「持負面態度」。表格中僅呈現持正面態度的百分比。

(2) 主要大國是指八大工業國組織 (Group of Eight, G8) 的成員國。

資料來源：2005～2012 年的資料是引用自陳郁芬 (2015) 對 Pew 網頁資料的整理，2013～2016 年的資料則為本文自行從相同來源的 Pew 網頁更新 (Pew Research Center Internet 2017)。

人出訪確實與提升各種其所欲達成的目的有「關聯性」的話，則這個虛擬變數「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是否已經出訪該國」應該要達成統計上的顯著性。^⑥ 要特別說明的是，由於資料取得上的限制，本文的興趣在於探討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與中國所要達成的各種政策目標之間是否具有穩定的「關聯性」（correlation），並非以「因果關係」（causation）的論證為本文的目的，因此在以下的各個統計模型中，本文僅作一個相對單純的呈現，僅測試在加入一些文獻上探討國際關係時經常使用到的控制變數後其關聯性是否依然存在，並不將重點放在各種統計上的穩健性測試（robustness checks）等等想要確證因果關係時所要探討的問題。

接下來，本文針對每一個議題一一檢證中國最高領導人出訪是否帶來了預期的效果。以下本文在評估最高領導人出訪效果時所使用的統計分析，除了模型三之外，都是使用包含了「國家固定效果」（country fixed-effects）的模型，這個模型在數學上的假設為「每一個不同的國家跟中國之間在本文所欲評估的依變數上都有著不同的起始點」，也就是各個國家是「自己跟自己比，看各項指標是否有比被中國出訪之前更高或是更低」，透過這種方式將「各個不同的國家一開始跟中國的關係就有所不同」的事實納入控制，只有在被出訪之後該國與中國之間的各種關係相較於本身在被出訪前的情形有出現顯著的提升或是減低，這個自變數才會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

首先探討中國在進行過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是否有效減少了雙方的衝突可能性。本文利用近年來國際關係研究中最著名的大數據（big data）資料庫——「全球事件語言調性資料庫」（Global Database of Events, Language and Tone，簡稱 GDELT）之中所記載的衝突報導來計算衝突的次數。^⑦ GDELT 資料庫的建構方式是由電腦程式自動讀取自 1979 年 1 月 1 日 0 時 0 分以來的全球主要英文媒體的新聞報導（也包括翻譯的外電），對每一個被報導出來的事件中辨認出「發起國（source）對目標國（target）在什麼時間點（time）採取了什麼樣的行為（action）」，然後使用「衝突與調解事件觀察計畫」（Conflict and Mediation

註⑥ 在數學上，只要在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雙方的關係「在平均上」較出訪之前有所改善，這個二元的自變數就會顯著，以這種方式來操作自變數是對中國最高領導人出訪的效果的一個較為寬鬆的認定。在本文之後的分析之中我們可以發現，即使是以這種較為寬鬆的方法來評估，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出訪所能帶來的公共外交效果仍屬有限。

註⑦ 資料庫的網址參見 The GDELT Project (2015)。有關本資料庫進一步的介紹，可見 Leetaru and Schrodt (2013)。

Event Observations，簡稱 CAMEO）的行為分類表對各種行為進行編碼，^⑧ 接著再使用 Goldstein 國際衝突合作量表（Goldstein conflict-cooperation scale）來決定各種行為在最衝突（-10 分）與最合作（+10 分）兩個極端值之間的分數（Goldstein 1992, 369-385）。^⑨ 據前兩種編碼方式的結果，GDELT 資料庫本身提供了一個將國家之間的每一次互動從最合作到最衝突分成四類的變數（變數名稱爲 QUADCLASS），分別爲「物質上的合作」、「言語上的合作」、「言語上的衝突」或「物質上的衝突」。本文計算中國與各國之間「言語上的衝突」或「物質上的衝突」占兩國所有被報導出來的互動紀錄上的比率，來作為兩國之間衝突可能性的測量。表 7 的模型一顯示，中國在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後並沒有顯著減少與該國之間的衝突可能性。

（五）是否增加了雙方實質合作的次數？

接著探討中國在進行過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是否有效增加了雙方實質合作的次數。^⑩ 本文計算中國與各國之間實際在「物質上的合作」有所作為的次數來計算雙方合作的次數，來作為是否增加了雙方實質合作的測量。表 7 的模型二顯示，中國在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後並沒有顯著增加與該國之間的合作次數。

（六）是否減少了雙方發生軍事衝突的機率？

前述表 7 的模型一和模型二的結果顯示了一個非常反直覺的發現，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出訪不僅未能減少雙邊的衝突，也未能增加雙方的合作。但還有一種可能性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出訪其真正的作用可能並不是在於增加或是減少兩國之間日常性的衝突或合作，而是在於減低兩國之間動用武力的可能性。爲了探究這個說法，表 7 的模型三探討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後是否減少了雙方動用武力的可能性。模型三以國際關係研究中經常使用的「軍事化國際衝突」（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 MID）的資料作為依變數，只要是該年在兩國之間曾經發生「一國向另一

註⑧ 有關 CAMEO 的詳細編碼方式，可見該計畫的官方網站的說明（CAMEO Event Data Codebook 2017）。

註⑨ 有關 Goldstein Scale 的量表可以參見 Goldstein (1992)。

註⑩ 本文在統計衝突可能性的時候，是計算「言語上的衝突」與「物質上的衝突」占雙方總互動次數的比率，而在計算合作次數的時候，是只計算「物質上的合作」次數而不計算「言語上的合作」次數，其原因在於，計算兩國關係是否改善的時候，在「衝突」的部分，不論是言語上的衝突或是物質上的衝突，對雙方來講都是造成負面印象的互動，所以一併計算之；然而，在「合作」的部分，因為言語上的合作大多是形式化的內容，因此必須計算雙方實質上的作為才能真正掌握到雙方是否有進行實際的合作。本文也試過同時將「物質上的合作」與「言語上的合作」納入計算，其結果未明顯改變。

表 7 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的各種影響

模型編號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模型八
[依變數] _{t-1} 中國與各國的雙邊衝突次數占雙方總互動次數的百分比	0.030*** (0.006) 4.61 0.000	中國與各國的雙邊實質合作次數	是否發生軍事化的國際衝突	雙方的貿易額占中國 GDP 的比值 (%)	雙方的貿易額占他國 GDP 的比值 (%)	雙方共同加入的跨政府國際組織的數目	其他國家投票模式與中國相同的比率	其他國家投票模式與美國不同的比率
[自變數] ₁ 是否進行出訪(未加控制變數)	0.030*** (0.006) 4.61 0.000	模型未收斂	1.965*** (0.397) 4.95 0.000	0.030*** (0.006) 4.61 0.000	0.004** (0.001) 2.70 0.007	0.159 (0.084) 1.90 0.058	0.020*** (0.004) 5.74 0.000	0.034*** (0.004) 8.87 0.000
[自變數] ₂ 是否進行出訪(加入控制變數)	-0.009 (0.008) -1.08 0.281	0.111 (0.094) 1.31 0.190	-0.098 (0.678) -0.14 0.886	0.000*** (0.000) 3.93 0.000	0.001 (0.002) 0.49 0.628	0.041 (0.093) 0.44 0.662	0.013** (0.004) 3.13 0.002	0.009* (0.004) 2.45 0.014
R-squared	0.030/0.035	N/A/	0.185/0.437	0.029/0.977	0.846/0.840	0.989/0.974	0.822/0.793	0.736/0.487
國家數目	184/141	N.A/144	195/145	184/145	163/145	191/144	192/144	192/144
觀察值數目	3,397/2,226	N.A/2,550	3,413/2,567	3,397/2,425	2,747/2,425	2,435/1,853	3,643/2,474	3,643/2,474

說明：(1)自變數格子中的四項數值依序為：係數、標準誤、t、P>|t|。

- (2)在 R-squared、國家數目和觀察值數目的格子中，斜線左方的數字為未加入控制變數時的結果，斜線右方的數字為加入控制變數時的結果。為了節省篇幅，各個模型控制變數的部分暫不列出，讀者若有需要歡迎隨時以 email 向本文作者聯絡索取本文的各項資料以及 STATA 工作流程檔案。
- (3)模型一和模型二使用廣義估計方程式負二項迴歸模型 (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 with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採用分層穩健標準誤 (clustered standard errors)，並假設在時間上存在著一階自我相關 (first-order autocorrelation)，包含依變數推遲一年的取值。
- (4)模型三使用勝算對數模型 (logit regression model) 和分層穩健標準誤 (clustered standard errors)，並使用 splines 校正兩國維持和平的時間。
- (5)模型一、二、三、六、七、八的控制變數包含：雙方的人均國民所得、是否有結盟關係、是否接壤、雙方的政體分數、雙方相對實力的比值、各國對中國的貿易依賴程度、中國對各國的貿易依賴程度，以及兩國首都之間的距離。
- (6)模型四、五的控制變數與其他模型相同，僅去掉兩個作為依變數的「各國對中國的貿易依賴程度」和「中國對各國的貿易依賴程度」。
- (7)*p<0.05, **p<0.01, ***p<0.001。

資料來源：關於各個變數的編碼和資料來源，請參見本文的附表 3。

國威脅使用武力、向對方展示武力，或是實際使用到武力」（Gochman and Maoz 1984, 586），則被定義為兩國之間有發生過軍事化的衝突。模型三的結果顯示，在包含控制變數的情況之下，中國曾經進行過最高領導人出訪的國家在被訪問後與中國發生軍事化衝突的可能性並未顯著減少，而在未包含控制變數的情況之下，中國曾經進行過最高領導人出訪的國家在被訪問後與中國發生軍事化衝突的可能性其實是增加的。這兩個資訊顯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對於降低兩國之間動用武力的可能性並沒有顯著的幫助。

（七）小結：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對於降低他國對中國威脅的感受效果並不明顯

本處透過對下列五個議題的回答來檢證中國最高領導人出訪政策的使用是否成功的降低他國對中國威脅的感受。第一，美國與日本的民衆對中國的態度是否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有所改善？第二，其他國家的民衆對中國的好感度是否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有所改善？第三，中國與其訪問國之間起衝突的次數是否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有所減少？第四，中國與其訪問國之間的合作數目是否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有所增加？最後，中國與其訪問國之間軍事化衝突發生的機率是否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有所減低？經驗資料的結果顯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對美國和日本對中國印象的改善並未帶來顯著的幫助、對其他國家對中國好感度的改變沒有帶來穩定的效果、對更多的雙邊合作以及更少的雙邊衝突沒有顯著的改善，也對於降低雙方發生軍事化國際衝突的機率沒有影響。從這些面向看來，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對於降低他國對於中國威脅的感受的成效應屬有限。在與中國的公共外交相關的經驗研究中，Zhou and Luk（2016）發現，中國在世界各地設立孔子學院的作為，不僅沒有帶來預期中可增加中國的軟實力和文化吸引力的效果，反而是在各國塑造出了一種新的「中國文化威脅論」，變相地提高了各國對於中國的疑慮；Cao（2016）分析中國對美、德、英、法、蘇、日六個主要國家的公共外交，發現中國的公共外交並未帶來預期的效果。本文的發現與上述文獻的發現相符，在「是否降低了他國對中國威脅的感受」這一點上，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出訪並未顯著帶來正面的公共外交效果。

二、是否增進了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

中國公共外交的第二個目標是增進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本處將從「是否使中國在貿易上更依賴其他國家」、「是否使其他國家在貿易上更依賴中國」，以及

「是否增加了中國與其他國家共同參與國際組織的數目」這三個議題來探討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是否達到了增進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的目的。

（一）是否使中國在貿易上更依賴其他國家？

表 7 的模型四探討中國在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後是否增加了中國與該國家的貿易額在中國經濟上的重要性，也就是說，是否使中國在貿易上更依賴中國所出訪的國家，以雙邊的貿易額占中國 GDP 的比值來測量。模型四的結果顯示，中國與該國家的貿易額在中國經濟上的重要性，確實在中國進行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有所提高，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與「中國在貿易上更依賴中國所出訪的國家」兩者之間具有顯著的關聯性。

（二）是否使其他國家在貿易上更依賴中國？

表 7 的模型五探討中國在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後是否增加了中國與該國家的貿易額在該國經濟上的重要性，也就是說，是否使中國所出訪的國家在貿易上更依賴中國，以雙邊的貿易額占中國所出訪的國家的 GDP 的比值來測量。模型五的結果顯示，雖然中國與該國家的貿易額在該國經濟上的重要性確實在中國進行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有所提高，但是這個效果在加入其他控制變數之後在統計上的顯著性就消失了，可見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與「中國所出訪的國家在貿易上更依賴中國」兩者之間的關聯性並不是非常穩定。

（三）是否增加了中國與其他國家共同參與國際組織的數目？

表 7 的模型六從另一個面向來檢視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是否曾進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中國在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後，雙方共同加入的政府間國際組織（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GO）的數目是否有增加，因為這是一個雙方是否在政治上或是經濟上有更進一步的合作關係的一個指標。模型六的結果顯示，中國在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後與被訪問的國家之間共同加入的 IGO 的數目並未顯著增加，顯示了至少在這一個正式的制度層面上，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並未帶來直接的效果。

（四）小結：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對於增進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的效果並不明顯

本處透過對下列三個議題的回答，來檢證中國最高領導人出訪政策的使用是否達到了增進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的目的：第一，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是否使中國在貿易上更依賴其他國家？第二，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是否使其他國家在貿易

上更依賴中國？第三，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是否增加了中國與其他國家共同參與國際組織的數量？經驗資料的結果顯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雖然使中國在貿易上更依賴其他國家，但其他國家對中國的貿易依賴並未增加，而且其他國家與中國在共同參與國際組織的合作上也未有顯著進展。從這些面向看來，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對於增進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的效果應屬有限。

三、是否促進了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雙邊共同利益？

中國公共外交的第三個目標是促進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雙邊共同利益。在經驗分析的文獻中，最經常被使用的測量國家利益相似程度的指標，就是各國在聯合國大會中的投票模式。本處從「是否使其他國家與中國在聯合國大會有更相近的投票模式」以及「是否使其他國家與美國在聯合國大會有更不相近的投票模式」這兩個面向來看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是否帶來了顯著的影響。

以「世界各國在聯合國大會的投票紀錄」來作為國家與國家之間關係的測量其作法如下。首先，聯合國的各個會員國家都有資格在最後得以進入大會表決的各個議案中投票表決，而各國對於每一次議案的投票都有三種選擇：投下贊成票、投下反對票，或是直接棄權放棄投票。接著，由於聯合國大會每年都有高達數十次到數百次不等的投票，因此兩國之間投票模式的相似程度就成為測量兩國關係的一個參考指標。當 A 國家與 B 國家在某一個議題中的投票模式相同時——也就是當 A 投贊成，B 也投贊成；或是 A 投反對，B 也投反對；或是 A 選擇棄權，B 也選擇棄權，這三種情形中的任何一種情形出現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認為這兩個國家在這個議題面向具有相似的利益。當然，如果只有一次的投票，那麼兩個國家出現相似的立場很可能純屬巧合，並不能代表什麼，然而，當投票表決的次數一多的時候，一個國家與各個國家之間在國家利益上的相似程度就會開始浮現出來。在大多數的議題中投票選擇相似的國家，就表示在這些議題中他們的利益是較為相似的，反之，在大多數的議題中投票選擇相左的國家，就表示在這些議題中他們的利益是不同的。從聯合國大會的投票模式來看國家的利益是否相似是有理論上的根據。在許多的文獻中，許多學者們已從各國在聯合國大會中的投票行為發展出許多測量國家間利益關係相似程度的指標，如學者 Gartzke（1998）就從各國在聯合國大會中的投票行為計算出各國之間的利益相似程度。Bailey, Strezhnev, and Voeten（2017）等人亦應用矩陣模型，以「美國所領導的自由世界秩序」這個面向為基準，從各國在聯合國大會各個議題的投票模式中，計算出各國對於「美國所領導的自由世界秩序」的理想點距離美國本身的理想點有多遠。在國際關係學界的討論中，伴隨著中國崛起而

來的重要議題就是中國到底會不會在各方面開始挑戰由美國所領導的世界秩序，因此探究各國在中國最高領導人出訪前後在聯合國大會中的投票行為是否轉變就成為一個關鍵的指標。^⑪

（一）是否使其他國家與中國在聯合國大會有更相近的投票模式？

首先本文檢視中國在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後「是否使其他國家與中國在聯合國大會有更相近的投票模式」。表 7 的模型七的統計結果顯示，其他國家在中國進行了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其投票模式與中國相同的比率平均起來顯著增加了約 2 個百分點，可見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與拉近其他國家與中國之間的利益相似程度兩者之間有著顯著的關聯。

（二）是否使其他國家與美國在聯合國大會有更不相近的投票模式？

接著本文檢視中國在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後，「是否使其他國家與美國在聯合國大會有更不相近的投票模式」。關於中國崛起是否將對美國所領導的世界秩序構成挑戰，在文獻中有一個極受歡迎的陰謀論點，這個論點認為，中國雖然在表面上並未挑戰美國所領導的體系、甚至是顯示出樂於做一個美國體系的搭便車者的樣子，但其實中國已經默默地在世界各國沒有留意的情況之下完成了一系列破壞美國體系的布局（Pillsbury 2015）。其中，一個有趣的說法是，中國在拉近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的同時，也使其他國家跟美國之間的關係開始疏遠。表 7 的模型八探討「中國在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後是否使其他國家與美國在聯合國大會之中有著更不相近的投票模式」。模型八的結果顯示，中國進行過最高領導人出訪後的國家，其投票模式與美國相同的比率平均起來顯著減少了約 3 個百分點，出現了其利益相似程度更遠離美國的趨勢。

（三）小結：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與他國「親近中國、疏遠美國」的決定有關

本處從「是否使其他國家與中國在聯合國大會有更相近的投票模式」，以及「是否使其他國家與美國在聯合國大會有更不相近的投票模式」這兩個面向來看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是否帶來了顯著的影響。經驗資料的結果顯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與他國在聯合國大會投票模式上「親近中國、疏遠美國」的決定有所關聯。從這個指標看來，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對於拉近中國與他國的雙邊共同關係來說確實有著一定的影響力。

註⑪ 近期亦有學者從這個指標去探討中美之間的競爭關係是否更加激烈，參見 Johnston（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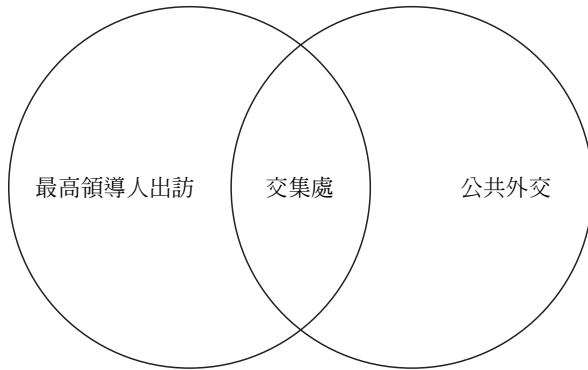
肆、結論

自從冷戰結束、中共政權進入後鄧時期之後，中國亦開始積極投入各項公共外交布局。在中共官方的聲明裡，中國政府宣告了至少三項想要透過公共外交策略來達成的主要目標：第一，降低他國對中國威脅的感受；第二，增加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第三，促進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雙邊共同利益。本文分析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出訪策略從冷戰結束後實施以來至今是否確實達成了上述三項公共外交目標，實證資料顯示，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出訪不論是在「降低他國對中國威脅的感受」上或者是在「增加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上，所達到的效果普遍都不顯著，反而是與「使出訪國的國家利益更趨近中國、更疏遠美國」的這個事實有著穩定的關聯性。

最後必須說明的是，本文在研究範圍上有幾個明顯的限制。第一，如果以一個更加寬廣的認定來看，中共最高領導人所進行的出訪，是屬於「元首外交」這個概念的子集合，「元首外交」的範圍更加寬廣，還包含了各種非冠以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名的諸多外交行為；第二，本研究也認識到，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出訪行為的目的，自然包含了「公共外交」的政策目標，以及「公共外交之外」的政策目標，本文的目的即在於分析中間這個兩者交集之處（如圖 6 所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出訪到底在公共外交上帶來了多大的效果；此外，中國其他重要政治人物的出訪以及在其他重要國際場合的出席，確實都有公共外交的效果，但如何適當定義「其他重要政治人物是哪些」以及「其他重要國際場合是哪些」，則是一個更具有爭議性的問題。在上述的限制之下，本文將分析的範圍限縮於較為能夠清楚定義的「最高領導人」的出訪，即是希望能夠盡量避免研究範圍不清楚的爭議。未來的研究若能更清楚定義範圍的話，則應能擴大於研究中國的「元首外交」的種種行為，不需拘泥於「最高領導人出訪」這個較為限縮的範圍。¹²最後，由於中國與各國在各種政治、經濟、軍事或文化上的交往與互動的方式甚多，並不僅僅只限於在最高領導人出訪上的互動，因此雖然本文已經盡可能地在統計模型中控制了其他重要變數的影響以盡可能地分離出最高領導人出訪與各種因素之間的平均關聯性，但必定無法完全考量到所有的因素或者是排除某些較非系統性的因素的影響，本文的研究希望能夠提供一個總體趨勢上的發現，未來的研究可以「個案分析」的方式來更深入地探討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對於個別國家的影響。

註¹² 本文的兩位作者感謝其中一位匿名審查人所提出的這一項建議。

圖 6 最高領導人出訪與「公共外交」之間的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長久以來，由於中國外交政策在決策過程中的不透明性太高，因此對於中國外交行為的分析，在文獻中大多只能根據有限的資料進行推論，較少針對各種說法進行較具有可否證性的分析，特別是，雖然分析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或是公共外交策略的政策類討論甚多，然而截至目前，尚未有研究對於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到底能夠帶來多大的公共外交效果進行系統性的評估，本文的目的，即在於透過經驗資料來補足文獻中的這個缺口，在經驗證據上盡可能地彌補了這個文獻中的不足。唯受限於許多控制變數與可能的敵對解釋目前仍欠缺適合的資料，故本文主要探究的是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出訪與各項指標之間的「關聯性」，以提供後續研究的先行文獻，並未進一步分析其背後的「因果關係」。更多有關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與公共外交政策的問題，例如，哪一些國家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確實改善了與中國的關係和對中國的觀感？哪一些國家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與中國的關係和對中國的觀感反而變得更糟？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各國改善或是未改善其對中國的態度的原因是什麼？而在其中發揮影響力的關鍵變數又是什麼？對這些關於中國最高領導人出訪或是公共外交政策的重要問題提供更進一步的因果關係檢證，是未來的研究可以繼續進行的方向。

* * *

（收件：106 年 3 月 2 日，接受：109 年 2 月 17 日）

附錄

附表 1 後鄧時期中國最高領導人出訪的出訪次數與出訪國家之統計（1993～2019 年）

年度	領導人	出訪次數	出訪的國家數目與國家清單	出訪各國的日期	出訪天數
1993	江澤民 192 天	1	1。巴西。共出訪 3 天	• 11/23-25 巴西	3
1994		2	3。法國、新加坡、印尼 共出訪 7 天	• 9/8-12 法國	5
				• 11/8-9 新加坡；11/17-19 印尼	2
1995		2	4。芬蘭、匈牙利、德國、 韓國 共出訪 18 天	• 7/5-7 芬蘭；7/8-11 匈牙利；7/11-15 德國	7
				• 11/13-16 韓國	11
1996		4	13。克羅埃西亞、埃及、 辛巴威、西班牙、挪威、烏 茲別克、吉爾吉斯、菲律 賓、巴基斯坦、尼泊爾、肯 亞、馬利、納米比亞 共出訪 33 天	• 5/8-11 肯亞；5/11-13 克羅埃西亞； 5/13-16 埃及；5/17 馬利；5/18-20 納米比亞 5/20-22 辛巴威	15
				• 6/23-26 西班牙；6/27-29 挪威； 7/2-3 烏茲別克；7/3-4 吉爾吉斯	10
				• 11/26-28 菲律賓	3
				• 12/1-3 巴基斯坦；12/4-5 尼泊爾	5
1997		3	4。俄國、美國、加拿大、 墨西哥 共出訪 19 天	• 4/22-24 俄國	3
				• 10/26-11/3 美國	9
	• 11/26-29 加拿大；11/29-12/2 墨西 哥			7	
1998		1	1。日本。共出訪 6 天	• 11/25-30 日本	6
1999	4	13。義大利、瑞士、奧地 利、蒙古、泰國、澳大利 亞、紐西蘭、英國、法國、 葡萄牙、摩洛哥、阿爾及利 亞、沙烏地阿拉伯 共出訪 41 天	• 3/20-24 義大利；3/25-27 瑞士； 3/27-30 奧地利	11	
			• 7/15-17 蒙古	3	
			• 9/2-6 泰國；9/6-10 澳大利亞； 9/13-14 紐西蘭	11	
			• 10/18-22 英國；10/22-25 法國； 10/26-27 葡萄牙；10/28-29 摩洛 哥；10/30 阿爾及利亞；10/31- 11/2 沙烏地阿拉伯	16	

年度	領導人	出訪次數	出訪的國家數目與國家清單	出訪各國的日期	出訪天數
2000	胡錦濤 224 天	3	8。土耳其、希臘、南非、塔吉克、土庫曼、寮國、柬埔寨、汶萊 共出訪 19 天	• 4/19-20 土耳其；4/21-23 希臘； 4/24-27 南非 • 7/3-4 塔吉克；7/5-6 土庫曼 • 11/11-13 寮國；11/13-14 柬埔寨； 11/17-18 汶萊	9 4 6
2001		4	11。智利、阿根廷、烏拉圭、古巴、委內瑞拉、俄國、白俄羅斯、摩爾多瓦、烏克蘭、馬爾他、緬甸 共出訪 24 天	• 4/5-7 智利；4/7-9 阿根廷；4/10 烏拉圭；4/12-15 古巴；4/15-16 委內瑞拉 • 7/15-18 俄國；7/18-19 白俄羅斯； 7/19-20 摩爾多瓦；7/20-22 烏克蘭； 7/23-24 馬爾他 • 12/12-13 緬甸	12 10 2
2002		5	9。德國、利比亞、奈及利亞、突尼西亞、伊朗、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冰島、立陶宛 共出訪 22 天	• 4/8-13 德國；4/13-14 利比亞； 4/14-15 奈及利亞；4/16-17 突尼西亞； 4/18-21 伊朗 • 6/10-11 拉脫維亞；6/12-13 愛沙尼亞； 6/14-15 冰島；6/16-17 立陶宛	14 8
2003		2	6。俄國、哈薩克、蒙古、泰國、澳大利亞、新加坡 共出訪 13 天	• 5/26-6/5 俄國、哈薩克、蒙古 • 10/20-21 泰國、澳大利亞、新加坡	11 2
2004		3	12。法國、埃及、加彭、阿爾及利亞、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烏茲別克、巴西、阿根廷、智利、古巴 共出訪 34 天	• 1/26-2/4 法國、埃及、加彭、阿爾及利亞 • 6/8-18 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烏茲別克 • 11/11-23 巴西、阿根廷、智利、古巴	10 11 13

年度	領導人	出訪次數	出訪的國家數目與國家清單	出訪各國的日期	出訪天數
2005		4	11。汶萊、印尼、菲律賓、俄國、哈薩克、加拿大、墨西哥、英國、德國、西班牙、韓國 共出訪 35 天	• 4/20-26 汶萊、印尼；4/26-28 菲律賓	9
				• 6/30-7/3 俄國；7/3-7/7 哈薩克	8
				• 9/8-13 加拿大、墨西哥	6
				• 11/8-19 英國、德國、西班牙、韓國	12
2006		2	9。美國、沙烏地阿拉伯、摩洛哥、奈及利亞、肯亞、越南、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 共出訪 24 天	• 4/18-29 美國、沙烏地阿拉伯、摩洛哥、奈及利亞、肯亞	12
				• 11/15-26 越南、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11/23-26）	12
2007		5	13。喀麥隆、利比亞、蘇丹、尚比亞、納米比亞、南非、莫三比克、塞席爾、俄國、瑞典、吉爾吉斯、哈薩克、澳大利亞 共出訪 34 天	• 2/1-12 喀麥隆、利比亞、蘇丹、尚比亞、納米比亞、南非、莫三比克、塞席爾	12
				• 3/21-28 俄國	8
				• 6/6-10 瑞典	5
				• 8/9 哈薩克；8/14 吉爾吉斯	2
				• 9/3-9/9 澳大利亞	7
2008		4	8。日本、韓國、塔吉克、土庫曼、哥斯大黎加、古巴、秘魯、希臘 共出訪 25 天	• 5/6-11 日本	6
				• 8/25-27 韓國；8/27-28 塔吉克、土庫曼	4
				• 11/16-26 哥斯大黎加、古巴、秘魯	11
				• 11/24-27 希臘	4
2010		4	7。巴西、委內瑞拉、烏茲別克、哈薩克、加拿大、法國、葡萄牙 共出訪 20 天	• 4/12-18 巴西、委內瑞拉	7
				• 6/9-12 烏茲別克、哈薩克	4
				• 6/23-27 加拿大	5
				• 11/4-6 法國；11/6-7 葡萄牙	4

年度	領導人	出訪次數	出訪的國家數目與國家清單	出訪各國的日期	出訪天數
2011		3	5。美國、哈薩克、俄國、烏克蘭、奧地利 共出訪 14 天	• 1/18-21 美國	4
• 11/6 奧地利				9	
• 6/12-20 哈薩克、俄國、烏克蘭				1	
2012		2	2。柬埔寨、丹麥 共出訪 10 天	• 3/30-4/2 柬埔寨	4
• 6/14-19 丹麥	6				
2013	習近平 153 天	4	13。俄國、坦尚尼亞、南非、剛果、千里達及托巴哥、哥斯大黎加、墨西哥、土庫曼、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印尼、馬來西亞 共出訪 26 天	• 3/22-23 俄國；3/24-25 坦尚尼亞；3/26-28 南非（3/26-27 南非德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 5 次會晤）；3/29-30 剛果	8
				• 5/31-6/6 千里達及托巴哥、哥斯大黎加、墨西哥（6/7-8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美「中」領導人會面）	7
				• 9/3-4 土庫曼（9/4-7 俄國聖彼得堡，G20 領導人第 8 次峰會）；9/7 哈薩克；9/8-10 烏茲別克；9/10-11 吉爾吉斯（9/12-13 吉爾吉斯比斯凱克，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 13 次會晤）	7
				• 10/2-3 印尼；10/3-5 馬來西亞（10/7-8 印尼峇里島，APEC 第 21 次領導人非正式會晤）	4
				2014	6
• 7/3-4 韓國	2				

年度	領導人	出訪次數	出訪的國家數目與國家清單	出訪各國的日期	出訪天數
2015				• 7/16-17 巴西（7/15-16 巴西弗大雷，金磚國家領導人第 6 次會晤、7/17 巴西利亞，「中」拉加勒比領導人會晤）；7/18-20 阿根廷；7/20-21 委內瑞拉；7/21-23 古巴	8
				• 8/21-22 蒙古	2
				• 9/12-14 塔吉克（9/11 塔吉克杜尚，「中」俄蒙三國首腦會晤、9/12 杜尚，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 14 次會晤）；9/14-16 馬爾地夫；9/16-17 斯里蘭卡；9/17-19 印度	8
				• 11/17-19 澳大利亞（11/15-16 澳大利亞布里斯本，G20 第 9 次領導人峰會）；11/19-21 紐西蘭；11/21-23 斐濟	7
		6	8。巴基斯坦、白俄羅斯、美國、英國、越南、新加坡、南非、辛巴威 共出訪 20 天	• 4/20-21 巴基斯坦（4/22-24 印尼，亞非領導人會議和萬隆會議 60 週年紀念活動）	2
				• 5/10-12 白俄羅斯（5/8-10 俄國，二戰勝利 70 周年紅場大閱兵）	3
				• 9/22-25 美國（9/26-28 美國紐約，聯合國 70 周年系列峰會）	4
				• 10/19-23 英國	5
				• 11/6 越南；11/6-7 新加坡	2
				• 12/1-2 辛巴威（11/29-30 法國，巴黎氣候峰會）；12/2-4 南非（12/4-5 南非約翰尼斯堡，「中」非合作論壇）	4

年度	領導人	出訪次數	出訪的國家數目與國家清單	出訪各國的日期	出訪天數
2016		5	12。沙烏地阿拉伯、埃及、伊朗、捷克、塞爾維亞、波蘭、烏茲別克、柬埔寨、孟加拉、厄瓜多、祕魯、智利 共出訪 21 天	• 1/19-20 沙烏地阿拉伯；1/20-21 埃及；1/22-23 伊朗	5
				• 3/28-30 捷克（3/30-4/1 美國華盛頓，第 4 屆核安全峰會）	3
				• 6/17-19 塞爾維亞；6/19-21 波蘭；6/21-22 烏茲別克（6/23 烏茲別克塔什干，「中」俄蒙第 3 次三國首腦會晤、6/24 塔什干，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 16 次會晤）	6
				• 10/13 柬埔寨；10/14-15 孟加拉（10/15-17 印度果阿，金磚國家領導人第 8 次會晤）	3
				• 11/17-18 厄瓜多；11/18-21 祕魯（11/19-20 祕魯利馬，APEC 第 24 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11/22 智利（11/22 智利，「中」拉媒體領袖峰會）	4
2017		5	7。瑞士、芬蘭、哈薩克、俄國、德國、越南、寮國 共出訪 12 天	• 1/15-16 瑞士（1/17-18 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	2
				• 4/4-5 芬蘭（4/6-8 美國佛羅里達州，美「中」領導人會面）	2
				• 6/7-8 哈薩克（6/9-10 哈薩克阿斯坦納，上海合作組織元首理事會第 17 次會晤）	2
				• 7/3-4 俄國；7/4-5 德國（7/7-9 德國漢堡，G20 第 12 次領導人峰會）	3
				• 11/12-13 越南（11/10-11 越南峴港，APEC 第 25 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11/13-14 寮國	3

年度	領導人	出訪次數	出訪的國家數目與國家清單	出訪各國的日期	出訪天數
2018		3	11。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塞內加爾、盧安達、南非、巴布亞紐幾內亞、汶萊、菲律賓、西班牙、阿根廷、巴拿馬、葡萄牙 共出訪 19 天	• 7/19-20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7/21-22 塞內加爾；7/22-23 盧安達；7/23-24 南非（7/25-27 南非約翰尼斯堡，金磚國家系列會議）	6
				• 11/15-16 巴布亞紐幾內亞（11/17-18 巴布亞紐幾內亞摩士比港，APEC 第 26 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11/18-19 汶萊；11/20-21 菲律賓	6
				• 11/27-28 西班牙（11/30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金磚國家領導人非正式會晤、11/30-12/1 布宜諾斯艾利斯，G20 第 13 次領導人峰會）；12/1-2 阿根廷；12/2-3 巴拿馬；12/4-5 葡萄牙	7
2019		6	9。義大利、摩納哥、法國、俄國、吉爾吉斯、塔吉克、北韓、尼泊爾、希臘 共出訪 19 天	• 3/21-23 義大利；24 摩納哥；24-26 法國	6
				• 6/5-6 俄國（6/7 俄國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	2
				• 6/12-13 吉爾吉斯（6/13-14 吉爾吉斯比斯凱克，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 19 次會晤、6/14 比斯凱克，「中」俄蒙第 5 次三國首腦會晤、6/14-15 亞信第 5 次峰會）；6/15-16 塔吉克	4
				• 6/20-21 北韓	2
				• 10/12-13 尼泊爾（10/11 印度清奈，「中」印領導人非正式會晤）	2
				• 11/10-12 希臘（11/12-14 巴西利亞，金磚國家領導人第 11 次會晤即系列會議）	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各種中國官方的紀錄。

附表 2 中共最高領導人制度化之前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出訪次數與出訪國家之統計
(1949~1992 年)

年度	領導人	出訪 次數	出訪的國家數 目與國家清單	出訪各國的日期
1950	毛澤東	1	1。蘇聯	• 1949.12/6-1950.2/27 蘇聯 註：時任國家主席
1957		1	1。蘇聯	• 11/2-11/20 蘇聯 註：時任國家主席
1978	華國鋒	2	4。朝鮮、羅馬 尼亞、南斯拉 夫、伊朗	• 5/5-5/10 朝鮮 • 8/14-8/21 羅馬尼亞；8/21-8/29 南斯拉夫；8/29- 9/1 伊朗 註：時任國務院總理
1957	鄧小平	1	1。蘇聯	• 11/2-11/20 蘇聯
1960		2	1。蘇聯	• 9/5-9/22 蘇聯 • 11/5-12/2 蘇聯
1961		1	1。朝鮮	• 9/9 朝鮮
1975		1	1。法國	• 5/12-5/18 法國 註：時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1978		4	7。緬甸、尼泊 爾、朝鮮、日 本、泰國、馬 來西亞、新加 坡	• 1/26-1/31 緬甸；2/3-2/6 尼泊爾 • 9/8-9/13 朝鮮 • 10/22-10/29 日本 • 11/5-12 泰國、馬來西亞；11/12-14 新加坡 註：時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1979		1	1。美國	• 1/29-2/5 美國 註：時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1982		1	1。朝鮮	• 4/27 朝鮮
1983		0	0	註：此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為李先念（任期： 1983 年 6 月 18 日~1988 年 4 月 8 日）
1984		0	0	
1985		0	0	
1986		0	0	
1987		0	0	
1988		0	0	

年度	領導人	出訪 次數	出訪的國家數 目與國家清單	出訪各國的日期
1989		0	0	註：此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為楊尚昆（任期： 1988 年 4 月 8 日～1993 年 3 月 27 日）
1990		0	0	
1991		0	0	
1992		0	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各種中國官方的紀錄。

說明：為了紀念毛澤東的地位，1975 年到 1978 年之間的中共憲法不設國家主席，直到 1983 年 6 月 18 日才由李先念接任中共恢復國家主席職位之後的第一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但一般認為此時中共中央的實際權力仍然是由鄧小平所掌握，所以本表僅列出實際掌權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華國鋒與鄧小平之出訪。

附表 3 本文所使用到的各個變數之測量、編碼與資料來源

變數	測量 / 編碼方式	資料來源
〔自變數〕		
中國是否已出訪該國	0：中國在該年尚未出訪過該國 1：中國在該年或之前已出訪過該國	作者自行編碼
〔依變數〕		
衝突性事件占雙邊互動事件的百分比	被媒體報導出來的物質性的衝突事件次數除以所有被媒體報導出來的雙邊互動事件	GDELT 資料庫，經由作者自行編碼
合作性事件占雙邊互動事件的百分比	被媒體報導出來的物質性的合作事件次數除以所有被媒體報導出來的雙邊互動事件	GDELT 資料庫，經由作者自行編碼
是否與中國發生軍事化的國際衝突	0：該國在該年並未與中國發生軍事化的國際衝突 1：該國在該年曾與中國發生軍事化的國際衝突	Ghosn, Palmer, and Bremer (2004)
與中國的貿易量占該國 GDP 的百分比	與中國的貿易量除以該國的 GDP	Barbieri and Keshk (2012)
與該國的貿易量占中國 GDP 的百分比	與該國的貿易量除以中國的 GDP	Barbieri and Keshk (2012)
與中國共同加入的國際組織的數目	計算雙方都是加盟會員國的國際組織的數目	Pevehouse, Nordstrom, and Warnke (2004)
投票模式與美國不同的百分比	該國在聯合國大會中投票模式與美國不同的次數除以該國在聯合國大會中的總投票次數	Bailey, Strezhnev, and Voeten (2017)
投票模式與中國相同的百分比	該國在聯合國大會中投票模式與中國相同的次數除以該國在聯合國大會中的總投票次數	Bailey, Strezhnev, and Voeten (2017)
〔其他控制變數〕		
中國的人均 GDP	中國的 GDP 除以人口數	Feenstra, Inklaar, and Timmer (2015)
其他國家的人均 GDP	其他國家的 GDP 除以人口數	Feenstra, Inklaar, and Timmer (2015)

變數	測量 / 編碼方式	資料來源
其他國家是否與中國有聯盟關係	0：如果雙方在該年並未簽定任何正式的共同防禦協定、中立協定或是同盟協定等其中的任何一種。 1：如果雙方在該年有簽訂任何正式的共同防禦協定、中立協定或是同盟協定等其中的任何一種。	Gibler (2008)
其他國家是否與中國接壤	0：不接壤。 1：接壤。	Stinnett et al.(2002)
其他國家的政體分數	在 Polity IV 資料庫中的政體分數。	Marshall, Gurr, and Jagers (2013)
其他國家與中國的相對權力比值	其他國家的 GDP 除以中國的 GDP	Feenstra, Inklaar, and Timmer (2015)
其他國家的首都與北京之間的距離的對數（英哩）	其他國家的首都到中國的首都北京市之間的距離（英哩）的對數值	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2017)
其他國家在該年是否與中國發生軍事化的國際衝突	0：無。 1：有。	Ghosn, Palmer, and Bremer (2004)

Evaluating the Public Diplomacy Effectiveness of Chinese Supreme Leaders' State-Visiting Diplomacy, 1993~2017

Sheng-Ya Amanda Lai

Maste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hien-Wu Alex Hsueh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1993, when the Cold War came to its end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entered the post-Deng era, China has begun to actively use public diplomacy strategy. Among the various CPC's public diplomacy tools, supreme leaders' state-visiting diplomacy is the one that is most commonly used. In official announcement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eclared at least three main goals that China wants to achieve by using public diplomacy: reducing other states' perceptions of China as a threat, promoting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other states, and harmonizing both sides' common interests. This article evaluates whether or not Chinese supreme leaders' state-visiting diplomacy has achieved its announced goals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 After

analyzing the empirical evidences,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although Chinese supreme leaders' state-visiting diplomacy fails to achieve most of its alleged public diplomacy goals, but it has succeeded in changing other countries' interests by moving them closer to China and further awa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ndings of this article shed light on both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supreme leaders' state-visiting diplomacy and the study of the Sino-US contestations.

Keywords: Public Diplomacy, State-Visiting, Chinese Supreme Leaders, Soft Power

參考文獻

- 日本內閣府大臣官房政府廣報室，2017，〈日本對外關係民意調查〉，<https://survey.gov-online.go.jp/index.html>，查閱時間：2017/1/17。Japan Cabinet Office Minister's Secretariat Public Relations Office. 2017. "Ribei duiwai guanxi minyi diaocha" [Japan's Foreign Relations Opinion Poll]. (Accessed on January 17, 2017).
- 余金武，2015，〈中國公共外交的內外維度：爭論、概念、關係〉，《觀察與思考》，(7)：43-50。Yu, Jin-wu. 2015. "Zhongguo gonggong waijiao de neiwai weidu: zhenglun, gainian, guanxi"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mensions of Chinese Public Diplomacy: Debates, Concepts, and Relations]. *Observation and Ponderation*, (7): 43-50.
- 李翔宙，2011，〈中國推動公共外交政策之探析〉，《全球政治評論》，(35)：53-80。Li, Xiang-zhou. 2011. "Zhongguo tuidong gonggong waijiao zhengce zhi tanxi" [Analysis for PRC's Promoting Public Diplomacy].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35): 53-80.
- 秦亞青，2009，〈中國特色外交思想和外交理論〉，秦亞青主編，《國際體系與中國外交》：243-248，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Qin, Ya-Qing. 2009. "Zhongguo tese waijiao sixiang he waijiao lilun" [The Thoughts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Ya-qing Qin, ed., "Guoji tixi yu zhongguo waijiao"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p.243-248. Beijing: Shijie Zhishi Chubanshe.
- 袁鵬，2013，〈新時期中國的大戰略：對「十八大」報告的戰略解讀〉，《現代國際關係》，(5)：3。Yuan, Peng. 2013. "Xin shiqi zhongguo de da zhanlue: dui 'shibada' baogao de zhanlue jiedu" [China's Grand Strategy in the New Century: The Strategic Analysis of the Report of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Contemporary Internal Relations*, (5): 1-9.
- 張清敏、劉兵，2008，〈首腦出訪與中國外交〉，《國際政治研究》，(2)：1-20。Zhang, Qing-min, and Bing Liu. 2008. "Shounao chufang yu zhongguo waijiao" [Leadership Travel Abroad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Quarterly*, (2): 1-20.
- 陳郁芬，2015，〈中國國家形象之建構：以胡錦濤時期為例〉，中國政治學2016年會暨「新局下的內外挑戰與政經治理：區域發展、分配正義、族群政治」國際學術研討會，花蓮：東華大學。Chen, Yu-fen. 2015. "Zhongguo guojia xingxiang zhi jiangou: yi Hu jin-tao shiqi weili"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Taking the Hu Era as Examp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6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ple Challenges to the New

-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olitico-Economic Governance of Taiwan: Regional Development, Distributional Justice, Ethnic Politics. Hua-lian: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 陳雪飛，2017，〈新中國公共外交的歷程與特點〉，<http://www.readhouse.net/articles/231826638/>，查閱時間：2017/2/27。Chen, Xue-fei. 2017. "Xin zhongguo gonggong waijiao de licheng yu tedian" [The Process and Features of China's Neo-Public Diplomacy]. (Accessed on February 27, 2017).
- 楊潔篪，2011，〈努力開拓中國特色公共外交新局面〉，《求是》，（4）：43-46。
- Yang, Jie-chi. 2011. "Nuli kaituo zhongguo tese gonggong waijiao xin jumian." [Strive to Build the New Page of Public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Qiu Shi*, (4): 43-46.
- 廖登山，2007，〈後冷戰時期中國軟權力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學位論文。Liao, Deng-shan. 2007. *Hou lengzhan shiqi zhongguo ruan quanli zhi yanjiu* [Studies on the China Soft Power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Taipei: MA thesi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Strategic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 趙可金，2011，《外交學原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Zhao, Ke-jin. 2011. *Waijiaoxue yuanli*. [The Essences of Foreign Policy].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 蔡東杰，2007，〈關於當前中國「大戰略」討論的辯證問題〉，《全球政治評論》，（17）：1-18。Cai, Dong-jie. 2007. "Guanyu dangqian zhongguo 'da zhanlue' taolun de bianzheng wenti" [The Debate for China's Grand Strategy: A Critical View].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17): 1-18.
- 蔡東杰，2014，《當代中國外交政策（三版）》，台北：五南。Cai, Dong-jie. 2014. *Dangdai zhongguo waijiao zhengce (San ban)*. [Contemporary Chinese Foreign Policy, 3rd edition]. Taipei: Wu-Nan Book Inc.
- 戴紹安，2014，〈中國文化軟實力政策研究：以國家漢辦下的孔子學院為例〉，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論文。Dai, Shao-an. 2014. *Zhongguo wenhua ruan shili zhengce yanjiu: yi guojia hanban xia de kongzi xueyuan wei li* [A Case-Study of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 Policy: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n Hanban]. Taipei: MA thesi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Strategic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 蘇淑民，2008，〈公共外交與中國國家形象的塑造〉，《教學與研究》，1：73-77。
- Su, Shu-min. 2008. "Gonggong waijiao yu zhongguo guojia xingxiang de suzao" [Public Diplomacy and Mold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Im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1: 73-77.

- Bailey, Strezhnev, Anton Strezhnev, and Erik Voeten. 2017.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1 (2): 431-456.
- Barbieri, Katherine, and Omar M. G. Keshk. 2012.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Trade Data Set Codebook, Version 3.0." <http://Correlatesofwar.org> (January 13, 2017).
- CAMEO Event Data Codebook. 2017. "CAMEO Event Data Codebook" <http://eventdata.parusanalytics.com/data.dir/cameo.html> (January 23, 2017).
- Cao, Wei. 2016. "The Efficiency of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9 (4): 399-434.
- Custer, Samantha et al. 2018. *Ties That Bind: Quantifying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and Its "Good Neighbor" Effect*. Williamsburg, VA: AidData at William & Mary.
- d'Hooghe, Ingrid. 2008. "Into High Gear: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 3 (1): 37-61.
- d'Hooghe, Ingrid. 2015.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Leiden: Brill-Nijhoff.
- Feenstra, Robert C., Robert Inklaar, and Marcel P. Timmer. 2015.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Penn World Tab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 (10): 3150-3182.
- Gallup Survey. 2015. "Americans' Opinions of China." <http://www.gallup.com/poll/1627/china.aspx> (November 28, 2015).
- Gartzke, Erik. 1998. "Kant We All Just Get Along? Opportunity, Willingnes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2 (1): 1-27.
- Ghosn, Faten., Glenn Palmer, and Stuart A. Bremer. 2004. "The MID3 Data Set, 1993~2001: Procedures, Coding Rules, and Description."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21 (2): 133-154.
- Gibler, Douglas M. 2008. *International Military Alliances, 1648~2008*. Washington, D.C: CQ Press.
- Gill, Bates. 2007. *Rising Star: China's New Security Diploma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Gochman, Charles S., and Zeev Maoz. 1984.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1816~1976: Procedures, Patterns, and Insight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8(4): 585-616.
- Goldstein, Avery. 2005.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ldstein, Joshua S. 1992. "A Conflict-Cooperation Scale for WEIS Events Data." *The Journal*

-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6 (2): 369-385.
- Haftel, Yoram Z. 2007. "Designing for Peace: Regional Integration Arrangements, Institutional Variation, and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1 (1): 217-237.
- Hartig, Falk. 2016. "How China Understands Public Diplomacy: The Importance of National Image for National Interes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8 (4): 655-680.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2003. "Is China a Status-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 (4): 5-56.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2019. "China in a World of Orders: Rethinking Compliance and Challenge in Beijing'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4 (2): 9-60.
- Kang, David C. 2007.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astner, Scott L., and Philip C. Saunders. 2012. "Is China a Status Quo or Revisionist State? Leadership Travel as an Empirical Indicator of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6: 163-177.
- Kurlantzick, Joshua. 2007.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ardy, Nicholas R. 2002.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 Leetaru, Kaley, and Philip A. Schrodtt. 2013. "GDELT: Global Database of Events, Language, and Ton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3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Convention, San Francisco, CA.
- Marshall, Monty G., Ted R. Gurr, and Keith Jagers. 2013. "Polity IV Project: Political Regim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s, 1800～2012." [http:// www. systemicpeace. org/ inscrdata. html](http://www.systemicpeace.org/inscrdata.html) (January 13, 2017).
- Medeiros, Evan S. 2007. *Reluctant Restraint: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Nonprolifera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 1980～200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deiros, Evan S. 2009.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 Nathan, Andrew J., and Andrew Scobell. 2015.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Nye, Joseph S. 2004.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NY:

Public Affairs.

- Paradise, James F. 2009.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Harmony: The Rol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Bolstering Beijing's Soft Power." *Asian Survey*, 49 (4): 647-669.
- Pevehouse, Jon, Timothy Nordstrom, and Kevin Warnke. 2004. "The Correlates of War 2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Data Version 2.0."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21(2): 101-119.
- Pew Research Center Internet. 2017. "Opinion of China."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 (January 15, 2017).
- Pillsbury, Michael. 2015. *The Hundred 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New York, NY: Henry Holt and Co.
- Saunders, Philip C. 2006. *China's Global Activism: Strategy, Drivers, and Tool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 Shambaugh, David. 2005. "Return to the Middle Kingdom? China and Asia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tinnett, Douglas M. et al. 2002. "The Correlates of War (Cow) Project Direct Contiguity Data, Version 3.0."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19 (2): 59-67.
- 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2017. "Data Sets."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January 23, 2017).
- The GDELT Project. 2015. "Global Database of Events, Language, and Tone." <http://gdeltproject.org/> (January 15, 2017).
- Zhang, Yunling, and Shiping Tang. 2005. "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Zheng, Bijian. 2005.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Foreign Affairs*, 84: 18-24.
- Zhou, Ying, and Sabrina Luk. 2016. "Establishing Confucius Institutes: A Tool for Promoting China's Soft Pow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5 (100): 628-642.